

创作谈

也许不是最好的相遇，却是最好的重逢

——写于长篇小说《立秋》之后

杜阳林

时间犹如光影一闪而过，我从激情满怀的青年，到了平静闲适的中年，总有残缺的旧梦缠绕，总有难忘的旧事感叹，于是2021年，我的长篇小说《惊蛰》正式出版发行。一些热心读者较为关心，主人公凌云历经艰辛，寻求生活奋进的力量，实现生命的绽放走向重生，后来进入城市怎么样了？

我曾在媒体工作了十几年，接触过那些离开乡村进城打工的人，他们缺乏相关工作技能，无法融入城市也不能回到故乡，他们的漂泊感和撕裂感，似一道无形的门，跨不进也迈不出他们所在的城市。我也见证过不少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时代大潮，演绎了激荡人心的时代故事。

来自读者的询问，与我内心的冲动，渐渐成为翻滚的碰撞。当我去年春季坐在书房电脑前，明白应该借助书写，将隐藏在岁月缝隙的故事梳理出来，因为那是无数人的梦想与追求，也是一代人的无奈与疼痛。原来这份冲动，已在我心里悄然落下一颗种子，《立秋》的动笔写作，只是给了它萌芽生长的机会，直到时序入秋，果实摇曳枝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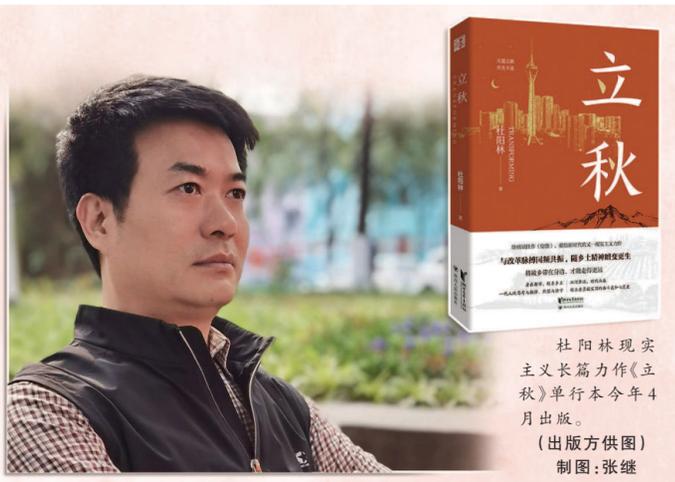
当年的中国伴随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迎来了改革开放新一轮的下海潮，人们纷纷投资商海。尽管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但那段跌宕起伏的岁月，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我所经历和我所了解的，是不少乡村青年搏击高考成功一跃，告别乡土生活来到城市谋生。在家乡人的眼里，这样的年轻人属于洗尽泥腿的城里人，不管大事小事，乡亲们都要求助他们，故乡于他们，不仅是一个地理符号，而且是一个深刻的精神印迹。乡亲们来城市的目的，是换一种活法，想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变成现代城市的打工者，他们五花八门的求助，有时超出了这些城里人的能力范围，但他们最终选择能帮则帮。这样的群体留有太多乡土的情结，对于时代转型的理解和认同，对于乡亲的接纳，却让他们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新的城市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切身感受到了伟大时代的蓬勃脉动。曾经蛰伏于乡间的人们都能纷纷觉醒，到更为广阔的天地寻找自己的出路，让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了向往与憧憬。个人摆脱不了时代背景的存在，他们打拼自己的事业，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自然规律，毕竟那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时代，一个有着无限可能的时代，改变窘迫的经济现状，是内外因的共同驱动，也是情理之中的选择，顺应了时

编者语

《立秋》是作家杜阳林继半自传体小说《惊蛰》(单行本2021年出版)后，奉献给新时代的又一现实主义长篇力作。作品以出生在四川农村的有志青年凌云进入大都市后的奋斗史，串联起了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代人顺应改革开放潮流，与时代共舞的追梦历程。2023年11月，刊发于当年第6期《收获》杂志；2024年4月，单行本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小说在文学界和评论界引发关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曹明华赞其成功捕捉到了改革脉搏与乡土精神的变迁，展现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特殊时代质感，纪实色彩让文本富有辨识度，彰显出作家还原时代标识的高超能力。



杜阳林现实主义长篇力作《立秋》单行本今年4月出版。(出版方供图) 制图:张继

代对怀有梦想之人的热切呼唤。

角色的变化，并未改变这个群体的初心，随着视野的延展，他们开始以市场思维方式，主动接纳并拥抱改革，有了自己的责任担当和精神担当，在城市规则与乡村习俗中，试图打破原有的疏离和尴尬。我所熟悉或不熟悉的一代年轻人，在改革的潮头编织梦想，面对浪奔浪涌的市场，遭遇了太多的困顿挫折。他们悲喜交杂的故事俯拾皆是，多少年来都在我脑海盘旋回荡，从未消褪。但我想创作的，不是时代奔流的创业史，而是一代人的心灵史。我也想借助自己的写作，化为一柄手术刀，剖开往事肌理，寻找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内在脉搏。我更想让自己的思考融入宏阔的时代，让个人的感触链接芸芸众生，故事才有纵深的走向，作品才会塑造一个观照人类发展本性的世界。

为此，我期待我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能在艰难逼仄的境遇里，演奏生存的旋律，释放仁者的光芒。我也愿意以生活体验与心路历程为核心，在他们命运起伏的追踪中，力图展开对时代变迁与个人命运的深沉探索和思考。

这份创作的认知，是指引我去完成《立秋》的火炬，也是让我醉心文学书写的坚实理由。在庞杂纷复的现实面前，人们关注地位的提升，钱财的聚集，一把“成功论”的戒尺，隔开了楚河汉界，物质财富往往代表一个人的富足与美满。我不是说追求物质、看重物质有什么不好，但人生在世，是否只有财富，才能衡量生存的

价值和意义呢？至少，这是不够全面的。

我和我接触过的朋友，都在接受这样的拷问。他们以平凡人的努力，成就更多人的时代梦想，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个体，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让市场充满勃勃生机。他们做出怎样的选择，担起怎样的责任，看上去是一念之差，其实内里已历经千山万水，涉过河谷险滩，艰难的行进之路，既是资本搏杀的展示场，也是命运的分水岭。

但我希望自己的书写，不仅有生存者的斑斑血泪，更希望现实生活与文学写作彼此叠加，呈现多元的人性。人性具有五彩斑斓的色调，不同的底色构筑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调色板，他们的善良和邪恶，宽宏与自私，热情或麻木，都在直面自己的难题。那些哭哭啼啼的过往，已为心灵作注，也就有了多种感受，如同永久的诱惑，让我不断地去叩问，在文字的国度，借助波澜壮阔的时代，与我一一道去探索生活的未来走向。

时代洪流会冲刷人性的底色，每一个生活的人，为了自己的梦想，有时是攥着痛苦做出选择的。即便抗争内讷克制，甚至窝囊卑微，不得不承受委屈，不得不坚守退让，遭受各种压力与伤害。每一代人都会在时代浪潮中不断选择与妥协，支持他们守住初心的，是西西弗斯式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敢。对这个著名的“悲剧英雄”，加缪却说“人一定要想东西西弗斯的快乐”，因为“向着高处挣扎本身足以填满一个人的心灵”。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现在的我们，因为没有任何成功的背

后，不沾染汗水和泪水，人生恩赐我们的，同时也剥夺我们，人生如冕我们的，同时也剥夺我们。

各行各业的人有自己的抱负和梦想，都有人性温暖的那束光，照耀他人前行的路，从而让人们的心胸开阔，也就有了新的希望。我力求通过对人生经历与心灵感悟的描绘，刻画中国大地发生的种种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对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产生的不同影响。

时光轮回，天道立秋。秋风起而叶落纷飞，枝桠明净清冷地面对她的世界，反而获得更加坚毅的力道。同时我慢慢懂得，生生不息的美，有时不在于繁花似锦，而是瘦枝寒鹊。于是在创作《立秋》期间，让自己的体悟，协调时代变迁与个体命运的叙事方式，尽可能让每一个人物都能逻辑自洽，尽可能让情节的流动富有内在的节奏感，尽可能让细腻坚韧和柔软的温暖，灌注读者心灵深处，走进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

感谢这次的写作，能让我顺着文字一直走到岁月深处，沉浸于火热的往昔，追寻那个时代特有的激情和真挚。然后，回味自己的现实生活，与《立秋》的人物彼此相望，发现我们所穿越的，所经历的，也许不是最好的相遇，却是最好的重逢。

从这个角度说，我书写的这部小说，藏着永不完结的追问，那么《立秋》引发的思索，就永远不会停歇。
（作者为四川省作协主席团委员、小说专委会副主任）



张炜最新长篇小说《去老万玉家》首发于《当代》杂志2024年第2期，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出版方供图)

■本报记者 王雪瑛

“美少年历险是早晚的事。舒莞屏长到十七岁，危险逼近。”当舒莞屏十四岁时，别过舒府，只身去南国的广州同文馆。三年转瞬而过，十七岁的舒莞屏千里迢迢返回故里。声名显赫的舒府远在北方半岛，离驻守重兵的青州旗营五十里……

阅读张炜最新长篇小说《去老万玉家》，迎面而来的是这样洗练的语言展开的故事线索，人物、地点、时间、事情，每个要素都在简明的告白中蕴含着未知的谜题，告白与谜题彼此对应吸引着读者往下“追”。从创作出《古船》这部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始，张炜开启了以家族史与地方志透视大时代变革的叙事模式。《去老万玉家》是张炜创作生涯中用时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首发于《当代》杂志2024年第2期，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炜参与了山东地方史料的汇编工作，他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19世纪末地方武装割据势力的规模和形态发生改变，出现了现代化转型，拥有从洋行等处购入的世界最新武器，而且有外国归来的留学人士等等。这与辛亥革命前后发生的东西文化交汇有关。小说的创作缘起和主要人物的原型来自于他对地方史料研读过程中的发现，张炜表示，这部小说最早的“种子”来自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2013年他已经积累了七八万字的片段，将其中意象写进了《去老万玉家》和《老万玉说》这两首长诗。2022年他完成了41万字的小说初稿，此后又两次压缩，最终删成26万字。“初稿是一个字一个字填在格子中的，慎思下笔。删削心碎，但只有痛心一删。”经由数十年的积累、酝酿、构思和删改，张炜创作出一部回望故土历史构思宏阔的长篇力作，与他2016年出版的小说《独药师》，构成展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双子作”。

小说书写历史变局风云激荡的十九世纪末，时代背景略早于《独药师》，北方胶东半岛之上，几股势力正碰撞涌动：清廷的官军、地方的武装割据、南来的革命党。俊朗的世家公子舒莞屏接受父辈意志，去南国同文馆新学堂修习英语、地理等新学，意在开展东西交流的“洋务”。十七岁那年，舒莞屏自广州抵上海、烟台返回故里，在返家途中遭遇匪徒劫持，这是他的人生中第一次历险，所幸被舒府管家吴院公深入虎穴拼死相救。舒莞屏的父母双亡后，府邸执掌者为伯父舒员外。三年后，吴院公又被奸人下毒所害，生命垂危之际急电召回舒莞屏，告之以家族秘密，并将一幅秘藏的《女子策马图》、一封亲笔书信交给他，恩师吴院公辞世七日，舒莞屏带着痛惜、忧伤和恩师的嘱托，踏上了寻找《女子策马图》的主人万玉之路。

沙堡岛的春天盛隆浩大，超越了舒莞屏记忆中的任何一个地方。比起难忘的舒府之春，那里竞相开放的紫荆、迎春和连翘，还有娇羞的海棠，这旷远海角沼泽野地的浓绿与绽放，才算疯狂放肆。他终于历经重重阻隔水路陆路的交替，种种关隘多次盘查的考验，来到了万玉的大营沙堡岛。

他已经告别大雪压境的严寒冬季，南风推开一道巨大的屏风，他终于相遇了一片斑斓春光，相遇了统辖一方的万玉大公，看着她一手持枪，长发披肩，骑马前行，一件深色披风在身边飘扬，迎接欢庆大捷……那幅女子策马图，在他的眼前复活了。他被奉为上宾，完成交付信函与《女子策马图》的使命之后，先是选择离开大营，准备东渡异乡；后来他还是决定留下，不负万玉大公信任，帮助军师冷霖渡担起总教习的重任。他带着卫士巡查各个营地，对整个机构和地域情况更加熟悉，但俨然不知最大的危险正在身边生成……

小说以第三人称主人公舒莞屏的视角深入万玉大营的旅程为发展线索，以“一镜到底”的营中探究，不断发现层层伪饰。张炜最初想过采用第一人称，有较强的亲历感。但写作中他又觉得客观性受到了削弱，“亲历与目击的视角，在本书中异常重要，在使用第三人称的同时，相对固定于本人视角，可以兼收并蓄两种人称之长”。张炜以现实主义的有力笔触描绘出丰富的历史图景，呈现世纪初青年在时代漩涡中的生命历险：从热血沸腾的轻信到烈焰焚身后的觉悟，这是钻心疼痛后的领悟，舒莞屏选择义无反顾不惜一切地冲破罗网，这是他历经险境走出迷途的成人礼。

评论家官达评价小说以冷峻的笔触直达偏僻幽微，常人难以察觉的人性角落。张炜重点塑造了舒莞屏、冷霖渡、万玉、小棉玉、吴院公五位主要人物。舒莞屏的纯粹坚定与百折不挠的探索，冷霖渡身上冷静理性与偏执迷狂的两面性，万玉的复杂难测与自我掩饰，吴院公的勇毅坚韧与赤诚悲情，小棉玉的稳重压抑与胆怯无奈。作家注重审视人物在历史风云变幻中的生存和选择，在伴随着枪炮威胁的日常生活中，在人物关系的发展中揭示人物内心丰富的层面，让读者思索处于时代激流中的人物命运：个体的渴望与困顿，理性与情感，人性的复杂与黑暗，刻画出人物处于历史境遇中的局限性与其真实性。

《当代》执行主编徐晨亮认为，作品延续了张炜的艺术探索，洗练而精纯，在二十多万字的篇幅里承载了巨大的信息量，堪称兼备人文视野与诗性表达的力作。在参与《去老万玉家》编辑的过程中，徐晨亮的脑中也不断回想着这样的意象：历史河道中不息的奔流和一位作家不断扩展的诗学版图，“从而立之年创作的《古船》，到这部长篇小说，他始终如一‘奔涌的热情’与‘执拗的勇力’，已凝固在时间中，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宝贵经验的一部分”。

张炜最新长篇《去老万玉家》是其创作生涯中耗时最久的作品

时代巨变的激流中，青春生命的成人礼

作家马伯庸、那多在上海书城畅谈类型文学创作

谜底揭开，悬疑小说真正的挑战开始了

■本报记者 许畅

“从创作者角度来说，当然会受到各种作家的影响。写作是从模仿开始的，先让自己喜欢的作家人手，再把优点融会贯通潜移默化成自己独有的风格。”刚刚过去的周末，作家马伯庸与那多携新长篇相聚上海书城福州路店，畅谈类型文学写作，并列出了影响自己的书单。

在他们看来，悬疑小说非常考验作家，写一个吊人胃口的开头总是容易的，但要把故事讲下去，让真正的高潮把开头压过去，更难。“不然，容易给读者虎头蛇尾的感觉。好故事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解谜本身，还在于写出角色探寻自我的独特成长路径。哪怕一开始就把谜底揭开，作家也要有信心与功力留住读者，这是对悬疑小说家真正的挑战。”两人如是感慨。

推翻“定式”后如何写出新意

业界认为，悬疑推理在世界范围内是较为成熟的通俗文学类型，人物设置、情节结构、核心诡计、写作技巧甚至写作禁忌都已逐渐透明化，在当下要写出新意属实不易。

对此，那多直言，多年创作中，他不断“推翻”过去的自己，尝试不同的写法。比如，写《骑士的献祭》一开始就告诉读者谁是凶手，“失去了这个悬念，就要求我在其他方面用更多努力去吸引读者”。新长篇《请记得乐园》凸显的主题是“有时候，爱比死亡更像一场冒险”——小说中，罪责难逃的笑笑，只身来到桃源民宿，意外撞进藏匿多年的谜团……

作品没有局限于单一“社会案件奇观”或“撒狗血”，旧案追踪主线故事之下，延展出动人的叙事空间，在人物丰满度、人性善恶的书写上，具有不同层次的厚度。

从三国事件簿系列、那多手记系列、巫术系列，到近些年《19年间谋杀小叙》《人间我来过》等作品，那多的写作轨迹或多或少浸润了不同悬疑风格的影子。他回首青少年时期，带有悬疑、推理、软科幻等色彩的



作家马伯庸(右)、那多携长篇新作在上海书城畅谈文学创作。(出版方供图) 制图:张继

《卫斯理》占领了精神世界，对“设置悬念”产生了偏爱。

“很长一段时间，我爱看丹·布朗《达·芬奇密码》这种叙事速度快的作品，一个接一个悬念，几乎不给你喘口气的间歇。”他在小说中直观感受到“电影感”，包括如何在关键时刻抓住读者，节奏感十足。他写下《百年剧本迷咒》和《甲骨文》向前辈致敬。

此后，那多转向了“慢”——东野圭吾《白夜行》不再追求快，“而是有更多回味，哪怕过了好几年，你可能还会记得书里某个画面。小说不以事件为中心，而是以人物为中心，看恶之藤蔓从何而来，往何处去。将人物成长和犯罪情节同步进行，铺陈更广袤深刻的社会议题”。

伊坂幸太郎《金色梦乡》则打开了一扇新大门。“看之前会预设这是一个暴力黑暗或烧脑的小说，没想到悬疑小说还能这样写，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如书名般梦幻！”那多试图寻找属于自己的“梦幻”，《请记得乐园》诞生了。“如果说30岁之前，兴趣集中

在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三四十岁以后，开始往现实题材转向，我对人更感兴趣了。”

从历史缝隙里“抠”细节

“从最初严丝缝合去写悬念的来龙去脉，到慢慢转向社会派推理风格，这是那多的一种进化，脱离了自己的舒适区，更多将目光投向社会议题。”马伯庸观察认为，将热点融入写作并不是单一“蹭热度”或人云亦云，“作家的责任感在于，还是要记录一些历史，表达自己的态度”。

因此，不管叙事节奏的快或慢，马伯庸更在意能否透过历史长河中的微小之物，窥测背后官场之道与巨澜人心，在生活与历史的缝隙中“抠”人性细节，寻找更多类型写作的可能性。

此前《长安十二时辰》急速推进情节，高潮迭起的背后，唐传奇中“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游侠与西方故事中“行于暗夜，侍奉光明”的刺客形象开始重叠，天宝三载上

元节的长安，在虚实相见里展开了别样画卷。到了《长安的荔枝》，艺术上的虚构与提炼，让古代史事与当代读者之间连起了一条共鸣之线，反而更能令历史本身反射出璀璨光芒。

就像《长安的荔枝》里的小小荔枝，《显微镜下的大明》账本上的一笔数据，新长篇《食南之徒》借“什么都能吃的岭南”里的一味酱料，让种种悬念融入烟火人间，不追求“反转”，而是让人性在美食面前逐渐露出本心。

“几年前去广州南越王博物院参观，看到有枚竹筒，上面是一棵壶枣树的园林档案。广东没有野生壶枣树，这棵枣树是哪里来的？再一查，南越王赵佗是河北真定人，而枣树恰好是真定特产。”马伯庸认为，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其实不是唐蒙这位美食侦探的经历，而是它所展现出的地理认知。“在那个时代的西汉人眼中，中原之外广大地区被重重迷雾所笼罩。若要把地图点亮，需要有勇气、谋略以及超越时代的地理直觉。”